#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使命任务

瞿林东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ZHONG GUO TE SE ZHE XUE SHE HUI KE XUE

## 核心阅读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宏伟事业，既要有宏大气魄，又要下细致功夫。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肩负起崇高使命，扎扎实实地将其向前推进，以“三大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未来。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指向，已经成为学术界积极探讨的重大课题。作为一名历史研究工作者，我主要从历史学专业的视角出发，结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全局，就“三大体系”建设谈几点自己的思考。

### “三大体系”建设已成为现实命题和重大任务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具体目标各有侧重，同时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内在统一体。从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进程来看，“三大体系”建设有其历史渊源。

早在1938年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到“学习”问题时就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里说的“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自信。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强调：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说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作出新的概括；二是“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绝非泛泛而论，毛泽东同志对这一论述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高度重视，推动其在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贯彻落实，成为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重要思想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对学术理论的需要不断增长，“三大体系”建设渐渐成为现实的命题和时代赋予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三大体系”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 学科体系建设具有战略意义

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学科体系的全局来看，学科体系建设是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利益等的需要而形成的合理的学科门类，是全局性的、整体性的，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在稳定和变动的有机统一中辩证发展，这是做好学科体系建设的出发点。

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需要对全局性学科体系做好评估、协调，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这个全局性的学科体系格局，以有利于各学科的相互借鉴、交叉，促进跨学科研究为诉求，旨在倡导一种“大学科”意识，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关于学科体系建设的全局意识和学科交叉意识。这将有益于各个具体学科的研究者做好自身的研究工作。举例来说，在历史学科方面，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中，论述了历史学与六大类学问都有关联，强调历史学与文学、哲学、社会学的关系，给人很多启发。又如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指出史学跟其他学科加强联系的趋势，把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以及天文学、地质学、古人类学等学科视为历史学的“姐妹学科”，揭示了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学科之间的关联自然发生变化。

### 学术体系建设重在反映学科特色

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建设的中间环节，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规定并引导着学术体系建设，其中以学术的理论体系最为重要。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是历史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正确路径。我们应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作出新的成绩。

学术体系当以全局的、整体的学科体系为基础，主要阐述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各分支学科的相互关系以及本学科在社会中的位置等问题，形成本学科自身的学术体系。比如，中国史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为对象，凸显中华文明的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今人作参考，彰显其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运用阶级分析、历史主义、文献资料与考古学成果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还原”历史真相或努力揭示历史真相。其研究价值在于：一是为一切社会科学提供借鉴，表明“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二是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中国史学科的这一学术体系，展现了它在学术上的中坚气势。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所论列的几个理论问题，即：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统观这些标目，能让人感受到其内在气势和外在格局的协调统一。《导论》附录的《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从更广阔的范围构建出中国史的学术体系。《中国通史》凡12卷22册，其中3—12卷各含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也展现出中国史的学术体系。该书在理论阐述、历史编撰、宏观历史思考三个层面，从不同视角构建的中国史学科的学术体系，有许多值得参考、借鉴之处。

### 话语体系建设展现学术前沿活力

话语体系建设是学术前沿活力的呈现，这是因为：在学术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需要通过与这一理论体系相联系的话语体系传播于社会，从而实现学科的任务和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当前乃至长远的需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话语权”重要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体系建设是更具体也更复杂的环节。这是因为，话语体系同人们惯用的概念、观念以至于一般学术术语都有密切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各学科因性质、任务的不同，在学术话语方面也各有特色。但相近的学科也会存在相通之处，自有一些共同的话语。可以这样说，“话语”不仅在人们思想上而且在人们心理上、感情上以至于实践上，都有十分密切的关联。

中国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连续发展的特点，拥有厚重的史学遗产，为当今中国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具体来说，在历史观念方面，如“天人之际”“时势理道”“穷变通久”“稽古”“随时”“民本”“人本”等，都是重要的概念。在史学观念方面，如“事、文、义”“才、学、识”“事实、褒贬、文采”“直书与曲笔”“采撰与叙事”“鉴识与探赜”“会通与断代”“史法与史意”“史德与心术”“记注与撰述”“信史与致用”等，都是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中国史学上长久地传承和广泛地运用，其中有些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融入当今史学发展之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结合，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应当强调的是，在话语体系建设上，尤其是在民族性、继承性方面，我们要有更加强烈的自觉和自信。话语体系的运用，是学术前沿活力的呈现。这也就意味着，话语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

“三大体系”建设是一项宏伟事业，既要有宏大气魄，又要下细致功夫。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肩负起崇高使命，扎扎实实地将其向前推进，以“三大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未来。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学术随笔

XUE SHU SUI BI

# 深化甲骨文研究 探索人类早期文明史

朱凤瀚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这为推动甲骨文研究更上一层楼提供了重要遵循。

甲骨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2017年，我国申报的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凸显了甲骨文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时强调：“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研究甲骨文，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今天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且有助于推动人类早期文明史探索。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一种表征。例如，2006年安阳殷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这自然得益于殷墟考古发掘成果已展现出一个堪称王朝都城的大型遗址，同时也与殷墟出土的10余万片甲骨刻辞有着直接关系。尽管迄今仍有许多甲骨文单字无法准确识别，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了解甲骨刻辞的内涵。甲骨刻辞中对商王朝的生动记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文明古国的存在及其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殷墟甲骨文所记录的商王朝后期的形态、发展状况及其特征，呈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国家模式。可见，我们之所以要深化甲骨文研究，不仅在于其所具有的文化遗产价值，更在于甲骨文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世界性学术价值，即揭示中国早期国家特征，进而思考世界上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模式等问题。

深化甲骨文研究，需要探讨和揭示甲骨刻辞内涵尤其是历史意义，从而开拓研究新局面。熟悉甲骨文研究的学者都知道，正确理解一片甲骨刻辞的内涵，并不仅仅取决于其中的所有文字是否可识，有时虽然文字已经成功考释出来，但相关的刻辞内容我们却没有完全读懂。学术在不断发展，前辈学人以为是正确的解读，也未必完全符合甲骨刻辞的真实内涵。因此，后辈学者应尽可能利用现代电子检索资源，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甲骨刻辞进行重新审视，尤其是那些关乎重大史实的甲骨文资料，例如大量直接反映商人文化和思想观念的祭祀刻辞、反映商人与周边古代族群关系的战争刻辞等，从而切实推动对中国早期国家乃至人类早期文明史的研究。

甲骨文研究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多学科交叉的学术积累，从而实现水到渠成。“水到”自然不全是凭个人的功力和天赋，还与某一阶段甲骨文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有关。一个人的学术突破，往往需要建立在众多学者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其他研究者考释甲骨文的见解即便不一定正确，也可以给有关研究者提供借鉴，使其少走弯路。所以，甲骨文研究的进展要靠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在扎实治学中有所突破。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 加强水利工程遗存保护和新中国水利史研究

王瑞芳

学苑论衡

XUE / YUAN / LUN / HENG

水运连着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一些地方几度繁华、几度衰落。历史上很多兴和衰都是连着发生的。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丰，必须善于治水。”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深刻理解治水对文明兴盛、国家兴衰和民生福祉的重大意义。中华民族的治水史尤其是新中国水利史，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水利事业的基本功能是除害兴利。除害，就是消除水害，对大江大河进行有效治理；兴利，就是兴修水利，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保障和扩大农田灌溉，发展农业生产。农田灌溉的发展，伴随中华文明整个发展历程，对国计民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早在先秦时期，灌溉排水设施就得到较快发展，各地兴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如魏国西门豹主持修建的引漳十二渠，楚国修建的芍陂，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汉代修筑的漕渠、龙首渠、白渠及成国渠等，完成于元代的京杭大运河，清代修筑的江浙海塘工程，以及遍布南方水稻种植地区的数百万口塘堰，华北各省的水井，西北地区的坎儿井等，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水利灌溉工程。这些灌溉工程支撑着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关乎中华民族的民生福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农田水利与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优先解决民生水利问题，动员群众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不断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大规模扩大农田灌溉面积，促进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大幅度提高城乡供水保障水平，切实加强水资源节约和保护。

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研究新中国水利史，离不开丰富而可靠的水利资料。水利资料主要分为三类：文献资料、口述史料和实物史料。目前，学术界比较重视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利用，对口述史料和实物史料的重视程度相对不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研究中国水利史，除了依据相关的文献资料，还要掌握相关实物史料。我国境内众多水利文物及水利工程遗存，就是研究中国水利史必不可少的实物史料，需要深入挖掘和利用。

水利史研究的实物史料，主要有水利文物、水利工程遗存（遗址、遗迹）等，包括与水利相关的历史文献原件、历史影像，还包括历史上遗存下来的水利碑刻、治水器具等。我国是有着悠久治水传统并高度重视水利建设的文明古国，数千年来兴修了众多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有些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有些已经成为历史遗迹。我们所说的新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实物史料，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建的各种水利工程遗存，它们为新中国水利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史料，也是研究新中国水利史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历史研究工作者要走向田野、实地考察水利工程遗存，不断深化新中国水利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建的水利工程遗存，对新中国水利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们不仅生动展示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成就，也见证着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梦想与辉煌，为我们进一步发展水利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加强新中国水利史研究，需要做好水利工程遗存和水利工程遗物的发现、勘察和保护工作，实施有效的分级分类保护措施。重要的水利工程遗存可以改造修建为专门的水利博物馆，落实保护单位及其职责。把这些遗存保护好，可以让子孙后代从一个侧面了解新中国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历程。做好新中国水利史研究工作，除了实地考察水利工程遗存之外，还应对全国水利工程遗存进行系统调查登记，并将其中具有历史价值的作为重要文化遗产加以有效保护，更好保留新中国艰苦奋斗的历史记忆。

**（作者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信息快递

# 促进历史学繁荣发展

## ——“中国史学界第十次代表大会”述要

杜继东

中国史学会主办，浙江省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中国史学界第十次代表大会”日前在浙江嘉兴召开。会议总结了中国史学会第九届理事会所做的主要工作，选举了第十届理事会理事，并举办了多场学术报告，交流历史学研究成果。

与会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鲜明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九个必须”的根本要求，这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史学会应进一步团结全国历史研究工作者，树立正确历史观，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推动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更好促进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

新书评介

XIN / SHU / PING / JIE

# 深化西方哲学史研究

## ——《西方哲学史》简评

鲍建竹

冯俊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哲学、哲学史和哲学史编纂学三重维度下展开哲学史书写，努力反映国内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该书主要具有如下特色和风格：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西方哲学史研究，辩证地看待哲学发展史中的必然性和内在联系、偶然性和外在联系。其次，既梳理了哲学的发展历史，又注重为发展当代哲学服务；既考察哲学自身的逻辑，又考察哲学和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宗教、艺术等的关系。再次，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独特研究视角和理解维度，努力在中西文化融合中拓展西方哲学研究的意蕴和内涵。